

論 点 摘 編

世纪之问:如何认识 and 应对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巨变

金碚在《东南学术》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当越来越多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不同的国家纷纷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大世界,特别是当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持续增长,以其巨大的经济规模改变着经济全球化格局时,存在利益差别的各国能否避免重大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理想或可行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必然是或只能是经济体系性质单一化的世界,还是可以呈现为多元化和多样性经济体共存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纪之问”。全球化所体现或要求的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各国经济之间的高度流动性、贸易畅通、投资交融,但并非是各经济体趋向于完全的同质化和同构化。中国所主张的“和而不同”应是世界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融而不同”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可行方向。经济学要以新的范式和视角观察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将进一步增强相互之间的包容性,这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经济全球化可以追求的目标。

真理标准问题与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会通

袁杰在《东岳论丛》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先前的思想家们之所以未能正确解决真理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是一味痴迷于在虚幻的太空中构建“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些理论体系脱离了现实生活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正确引领,必然凌空蹈虚乃至走向神秘主义,最终滑向了无限夸大意识能动性或完全无视意识能动性两个错误极端,这也是分别导致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产生的总根源。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一方面决定着人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一切理论由以产生的真正源头,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裁决任何一种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问题,只能以现实生活实践为

唯一尺度。通过对理论与现实生活密切关联的深入揭示,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现实生活理论,实现了真理标准问题与现实生活理论的融会贯通,既以现实生活的实践本质最大限度地确保了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的科学性,又使马克思现实生活理论在指导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永恒生命力,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伟大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生动体现。

影响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几个问题

张保伟在《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化不是简单、线性的“构建制度并执行”,而是一个理念、制度及实践非线性互动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制度理性的缺失、官本位文化、制度技术的滞后以及协商民主实践的不足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既相互影响、彼此关联,也有其各自的表现形式和发生机理,其优化和解决应从多个方面展开:积极培育与协商民主相适应的制度理性、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系统创新协商民主的制度技术以及全方位推进协商民主实践。基于此,应该将协商民主制度化置于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真正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问题意识出发,从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出发,在各种问题的相互关联与共同优化的过程中把握和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土地意识建构

高中建,李长焘在《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土地一直是中国这个传统农业大国发展与进步的基本问题,因而中国人对土地的实践活动总是受到土地意识的制约和影响。当今农村土地问题依然制约着农村小康社会的实现乃至后续发展,而且落后时代发展的传统土地意识则是当代中国土地

问题症结之瓶颈所在。因此,急需建构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求的土地意识: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土地政治意识,以生产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土地经济意识,以大地母亲思想为灵魂的土地文化意识,以维护稳定为前提的土地社会意识,以协调发展为基础的土地生态意识。

“马上就办”与实体经济绩效

邱海洋,胡振虎在《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马上就办”既是公共部门的工作作风与精神状态,也是公共部门的一种制度供给,而且还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至2015年相关数据发现:公共部门“马上就办”作风对实体经济绩效存在正向的直接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马上就办”对实体经济绩效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城市群,“马上就办”对实体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马上就办”能够通过影响技术创新从而最终影响实体经济绩效。基于此,要重视公共部门“马上就办”作风对实体经济绩效提升的促进效应。要不断加强先进典型的引领示范作用。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

彭文慧,王动在《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一方面基于目前我国以村民自治方式分配的扶贫开发体制,社会资本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其在市场化等正式制度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弥补和改善因市场化本身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拉大、环境污染和破坏等长期的贫困治理问题。而在市场化条件下,只有正确的、有效的激励措施才可能使得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资本在农村减贫方面发挥正向的积极作用、提升减贫的内生动力,同时更需要考虑低收入群体和贫困户的获得感和满足感,与市场制度紧密结合探索符合市场经济的激励性扶贫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对农村基层资源分配进行有效监督,降低因贫困治理内卷化产生的“精英俘获”效应导致的资源错配,并通过将贫困群体相对缺乏的社会资本纳入贫困户的识别系

统和作为确定发展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来提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回报率。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化下的经济行为或商业活动以“理性”为原则,而基于血缘、亲缘的中国传统农村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二者在以市场化为中心的新型农业化、新型工业化的农村地区的关系和矛盾已发生深刻变化,利益逐渐成为决定人们之间关系亲疏远近的有效筹码,理性开始进入农村社会生活,使得人情融入正式制度当中,同时非正式关系(社会资本)又渗入更多理性。因此,市场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地区要更好地发挥社会资本对于减贫的正向作用,无论是政策制订还是制度设计都需要更多考虑其人情与利益的关系和格局。

农村土地经营政策演进规律及启示

韩宁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农村土地经营政策经历了私有私营、公有公营、家庭承包制下的“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演进。“三权分置”旨在解决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与农村土地效率利用之间的矛盾。党的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和任务引领着农村土地经营政策的演进方向,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伴随着农村土地经营政策演进的整个过程。农村土地经营政策的演进反映出要充分发挥实践作用,试点先行,及时校正实践中的偏差;要循序渐进,注意政策的历史延续性,使法律确定政策实施中行之有效的成果。农村土地经营政策要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立足于传统农户,与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相结合,在农村社会治理完善中不断进行优化调整。

村域社会资本对村干部双重代理投入的激励效应

元红帅,王征兵,娄季春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从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网络3个维度测度村域社会资本表明,村域社会资本通过内在动机驱动机制、村民合作机制、信息分享机制、政府示范机制、政府信任机制、政府支持机制对村民代理投入和国家代理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政府有必要重视村域社会资本的培育,增强村域认同、村域信任、村域

网络,进而提高村域社会资本含量。可通过引导村庄撰写村志、开展民俗活动等多种方式,加深村民社会记忆,引导村民参与制定村庄发展目标,形成共同愿景,进而提高村域认同;强化一事一议制度建设,加大公共品资金投入,引导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等集体行动,进而提高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增加村域信任;注重红白喜事等村规民约的引导,鼓励村民帮工等互惠机制,实现村民人情网络的良性互动;加大合作社、秧歌队、书法协会等社会组织扶持,广泛开展村级文化娱乐活动,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增强村域网络。

高校科研产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孙向伟,丁成日在《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科技经费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高校科研产出存在异质性,不同类别的科研产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一样:论文发表数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技术成果转让收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专著数量不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高校科研产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城市层面,或者主要集中在地市的非农产业,高校科研产出对于广大农村地区和农业的发展作用有限,甚至是消极的抑制作用。在所有高等院校当中,本科层次的科研产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

城市扩张与经济增长质量的规模空间效应

刘荣增在《求索》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城市扩张作为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伴生现象,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基于2003—2017年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检验城市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效应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城市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大中城市的城市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小城市则由于人口规模小,难以形成有效的集聚效应而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作用不明显;从区域范围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市扩张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城市扩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应充分注重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考虑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城市扩张效应和不同区域城市扩张效应的差异,实现城市扩张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

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应

常文涛在《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主要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中介变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产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同时,这些中介变量的作用机制之间存在交叉影响。从全国范围来看,财政基础公共服务支出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增加对农村地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类的支出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点:第一,政府要履行好再分配调节职能,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使公共资源人均投入增量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公共品供给差距,逐步实现城乡公共资源配置适度均衡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加大对农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有效投入,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引导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下乡,打造乡村科技人才队伍;第三,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居民人均社会保障差距。

信息消费驱动下的传统产业变革: 基本内涵与内在机制

丁志帆在《经济学家》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信息消费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传统产业转型是信息消费发展的外在表现,信息消费发展是传统产业转型的内在动力。与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不同,信息消费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它主要通过替代效应、渗透效应、关联效应、融合效应与协同效应来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对于传统产业或企业而言,不应该寄希望于简单、被动地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来加强数字化建设,而是应当通过观念革新、组织再造与制度优化,加强与改善自身基于信息消费的价值创造能力,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良性互动中主动实现转型升级。对于政府及相关服务中介而言,应当明确自身在传统产业信息化转型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合理的产业政策、有效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撑环境。

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运行效率及提升策略

王亚飞,申庆元,姚琛在《区域经济评论》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结合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面板数据对其运行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08—2018年中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以平均每年8.7%的速度递增;从地区角度看,创新网络运行效率呈“东—中—西”阶梯差异态势,但差异态势逐年缩小;从省份角度看,全国26个省份运行效率存在异质性,大体可分为第一、二、三、四梯队;技术水平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作用要大于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贡献;技术研发阶段效率低于成果转化阶段效率,两阶段存在脱节现象。创新网络是推动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力量之一,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以提升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运行效率;依据不同地区、不同省份装备制造产业创新网络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组合,以提升运行效率;注重研发技术市场化,以提升成果转化阶段效率。

以“粮汇交易”完善粮食利益补偿机制

李存贵在《宏观经济管理》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与此同时,一直存在着“粮食大省、财政穷省”的“财粮倒挂”现象,极大地挫伤了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基于碳汇交易理论的基本原理研究粮食主产区的利益关系,可考虑构建“粮汇交易”体系。基本原理是粮食主产区由于粮食盈余,可获得粮汇收益;粮食主销区由于粮食亏欠,需要购买粮汇,以承担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粮汇交易机制在确定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量化依据、抑制其“粮食

生产歧视心理”、保障粮食主销区担负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等方面具有独到作用,可以成为推动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的有益尝试。

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

周荣军在《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能够促进文化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资本的积累、金融发展、研发投入、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均能显著促进文化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对外开放度对文化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明显。针对六类细分行业,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等文化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不显著,但是对表演和庆祝活动、艺术和手工艺、书籍和报刊、音像和交互媒介、设计和创意服务等五类文化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均显著为正,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有助于提升五类文化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基于此,一要完善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二要对不同文化产业实施差异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三要完善文化产业的知识产权评估与质押体系。四要广泛吸纳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寻求资本积累的渠道,加大金融发展力度,促进研发与基础设施投资,努力提升其经济发展水平。

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王丽娜在《学习论坛》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能够平衡信用评价权与信用修复权,通过信用激励措施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并通过行政黑名单的动态化管理实现信用重建。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行政黑名单移除制度法治化,但该制度仍存在行政复核的相关程序不够完备、行政救济功能发挥不足、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不周延、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不充分等问题。为重塑社会信用体系,应当建立行政复核的听证程序和中止程序,强化针对行政黑名单列入行为的行政救济,健全失信主体不良信用记录消除制度,提升行政黑名单移除的信息公示程度。

网络公共空间的治理路径

殷轶在《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网络公共空间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去中心化等特点,但网络技术造就的“公共性”却停留在工具层面,是自在的、没有实现社会自觉的公共性,尤其是其公共性的本质并没有真正展开,这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因此,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治理,推进网络公共空间从“自在的公共性”走向“自为的公共性”。一是在网络公共空间自在的公共性基础上实现内涵式提升。二是树立主体间共治理念,摒弃主客体管控思维。三是彰显公共事件的是非曲直,以个案推动大众向公众的转化,四是促进网络公共空间与体制的融合,推动官方、官员以公众的身份进入网络公共空间。

农民工的生存伦理与道德主体构型

方旭东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从生存伦理与道德主体的视角看,拥有同一身体的农民与农民工因社会身份的不同,在农村与城市这两种不同日常生活世界中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与道德准则。政治、生活、社会、道德是一个人身份的构型纬度,一旦离开对农民身份有着系统性约定的乡村场域,传统型农民不再拥有农民身份;大众传媒惯用的农民工话语也是一个消解农民的过程。农民工身份是都市社会底层的一种新型社交类型,在此社交类型中农民工的道德主体有着原生型、再生型、次生型三种构型。激活作为“农民”的“农民工”内心深处认同的、与社会公德相契合的生存伦理的引领力,比抽象的“人的城镇化”对社会公德的建构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农民还是农民工,不同的认识以及由此建构的不同社会治理方式对未来都市与乡村的道德构型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后乡土中国语境下乡土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苏泽在《当代教育科学》2020年第2期撰文指出,乡土文化教育是一种地域文化传承的教育,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是其得以开展的原始基点。在经受了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等转型的冲击后,中国乡村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等发生了结构性转变,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日渐瓦解,后乡土性特征日益明显。后乡土社会的到来,改变了乡土文化赖以滋生和延续的社会环境、文化土壤,同时也引起了乡土文化教育主体的缺位、教育时空的窄化以及教育内容的缩减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后乡土中国语境下,乡土文化教育的重兴应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强调政府顶层设计与乡村基层实践的通力协作,选择以政策为引领、乡情为纽带、激励为导向推动乡村文化主体的回归;以村庄“内生”为主、“植入”为辅的多元公共空间供给;以乡土文化为“圆心”,外源文化为“半径”,在坚守与创新之间延展乡土文化教育内容等发展路径。

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挑战与对策

李小玲在《新闻爱好者》2020年第3期撰文指出,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全新话语建构场域和传播范式。但与此同时,传播主体的话语权被多元化社会思潮所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和影响力被削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生硬,形式单一;网络法律法规不完善,新媒体平台“把关人”传播素养有待提升等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随之出现。新媒体时代,推进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不动摇,加强网上主流舆论话语权;把握舆情导向让主流声音更响亮,牢牢地把握工作的主动权;创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话语体系,巩固新媒体传播的主导权;完善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监管机制,掌握宣传思想文化阵地领导权。